

國家開發銀行金融研究中心

中國第十二個五年(2011-2015年)規劃

與人民幣國際化

對國家開發銀行的意義

劉遵義

研究專論第八號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
香港新界沙田澤祥街十二號鄭裕彤樓十三樓

中國第十二個五年（2011－2015 年）規劃 與人民幣國際化 對國家開發銀行的意義¹

劉遵義²

2012 年 12 月

1. 簡介

國家開發銀行（以下簡稱「國開行」）於 1994 年成立，為國有企業，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享有半主權信貸評級。作為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專為規模極大、風險極高或年期極長以致一般商業銀行無法承擔融資的發展項目籌募資金。自創立以來，「國開行」已為建設三峽水利樞紐、內地主要機場和海港、高鐵、大橋、高速公路、發電站、通訊網絡、城市集體運輸系統、基礎產業和創新工業等國家基建重點項目投入所需的大部分資金，並一直擔當中國城鎮發展的強大後盾，為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等城市提供信貸。「國開行」在陳元董事長的領導下蓬勃發展，截至 2010 年末，資產總額幾近 8,000 億美元，貸款額高達 7,150 億美元，是世界銀行的兩倍以上，而貸款不良率在 2010 年保持在 0.68%（自此更下降至低於 0.4%），這不僅在中國的銀行業是令人歎服的紀錄，對世界主要的銀行來說亦然。

¹ 本論文（英文本）將刊於即將出版的 Andrew SHENG, ed.,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 Tribute to Chen Yuan*。

² 作者為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李國鼎經濟發展榮休講座教授。本論文初稿於 2011 年 5 月 19 日在北京舉行的國家開發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發表。作者感謝劉麥嘉軒女士的意見和建議。本文僅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家開發銀行以及作者所屬其他機構的立場。

（電郵：lawrence@lawrencejlau.hk；網址：www.igef.cuhk.edu.hk/ljl）

中國現時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十二個五年（2011–2015 年）規劃已啓動實行，政府正全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與此同時，人民幣亦開始應用於商貿、投資、借貸的跨境交易。這些發展將可為國家開發銀行造就更廣闊的機遇。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十二五」規劃與人民幣國際化對國家開發銀行的意義和影響。

2.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2006–2010 年）規劃，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正式結束，規劃的大部分主要指標達到預期目標，甚至超額完成，其中包括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較 2006 年初降低了 20%。「十一五」規劃擬定，2006–2010 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以 7.5% 為目標，而實際上卻高達 10.84%。唯一沒有達標的是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規劃完結時佔 1.8%，稍低於 2% 的規劃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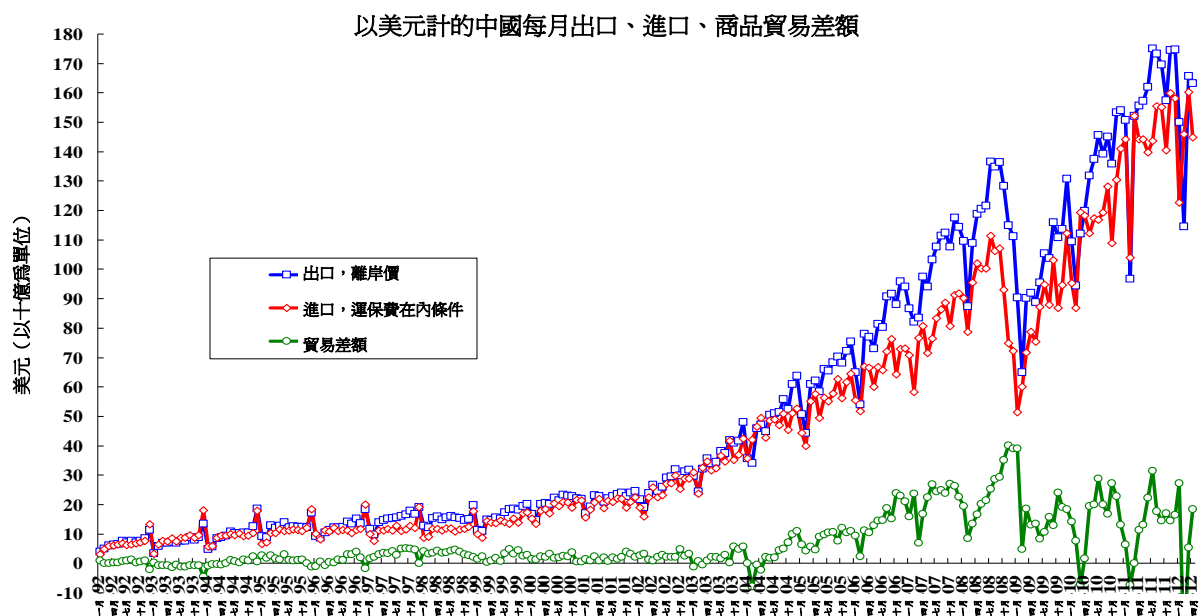
2011 年 3 月中，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十二五」規劃的基調僅為指示性，指令意味極淡薄。整個規劃最為矚目的，是把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從「十一五」規劃的 7.5%，調低至 7%。這個目標增長率幾乎可以肯定會被超越，就像「十一五」規劃的情況一樣（實際年均增長達 10.8%）。然而，把目標增長率減低，正反映了在這五年內，中國政府對經濟成長的着眼點將從過往的重「量」轉向重「質」。

「十二五」規劃的主線在於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要從外向轉往內需，從投入驅動走向科技創新驅動。規劃亦設定了另一目標，要求在五年期屆滿時大致達到商品與服務的對外貿易平衡。

「十二五」規劃又積極推動城鎮化，期望在五年內把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從 51% 降至 47%。加速城鎮化的一個作用，就是增加經濟轉型所需要的國內總需求。另外，教育和醫療衛生支出亦有所增加，特別是對農村地區加大投入，規劃並針對環境保育、保護和修復，以及水和空氣污染的防治，增加開支，其中更為提升能源效益、減少碳排放設下約束性指標，要求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減低 16%，而碳排放則減少 17%。規劃同時提出，採取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手段，以及提高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支出比重，完善社會保障網和養老保障制度，以求縮小實質收入差距。此外，規劃亦要求進一步加強對中、西部的基建投資，並在有條件的地區推進城鎮化，兩者相輔相成，以期改善區域收入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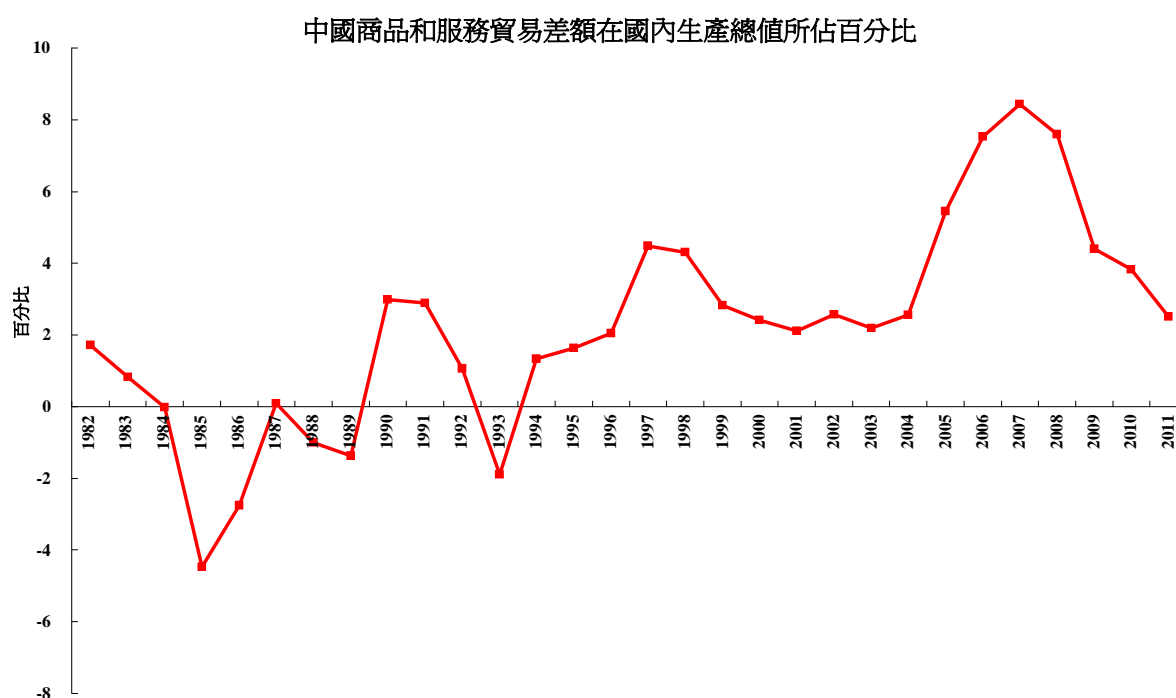
國際社會常常對中國經濟有一個錯誤印象，以為她主要依賴出口，特別是依靠出口盈餘來達到經濟增長。事實卻是，中國自 1978 年起，經濟一直以平均差不多 10% 的實質比率不斷增長，但卻要到 2005 年，才開始出現相對世界來說十分可觀的貿易順差。中國的經濟從來沒有依賴貿易盈餘來增長，現在、將來也不會。

圖一：中國每月出口、入口、貿易差額（以美元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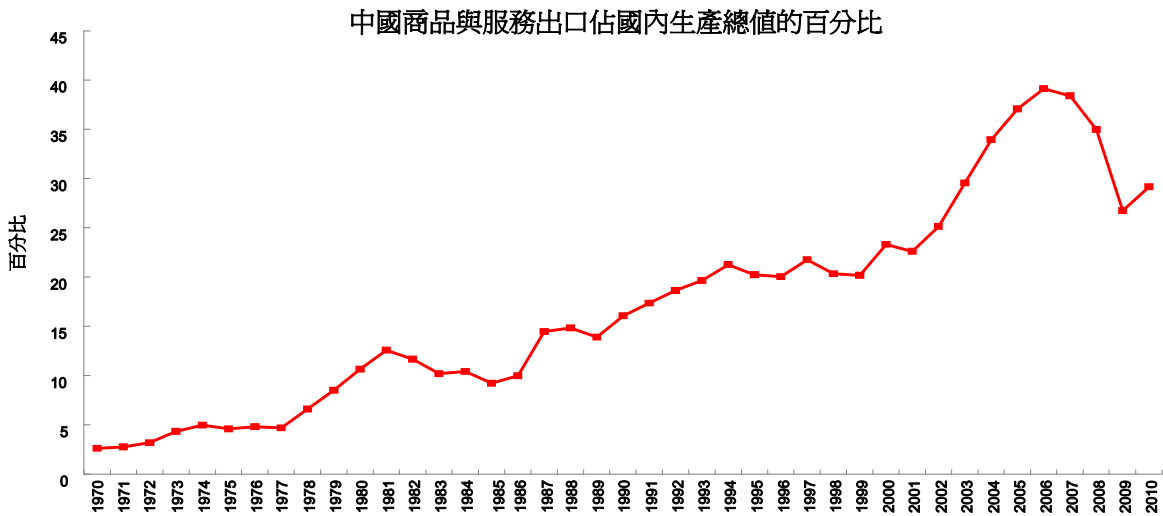
1982—2004 年間，貿易盈餘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所佔的比例一直徘徊在 -4.5%至 4.5%之間，平均佔國內生產總值 2%以下，其後開始上升，到 2007 年達至 9%的頂點，自此不斷大幅下降，在 2010 年跌至低於 3%，2011 年更低至 2%左右。正如美國所提出，中國要達到貿易盈餘佔國內生產總值 4% 的目標可說是易如反掌。相對於世界而言，中國商品和服務的國際貿易，在無需大幅調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情況下，預期在兩三年內可基本達到平衡。這個預期基於兩個原因，一是內地儲蓄與投資差距逐漸縮窄，二是自 2005 年年中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大幅實質升值幾近 25%。

圖二：1982 年至今，中國商品和服務貿易差額在國內生產總值所佔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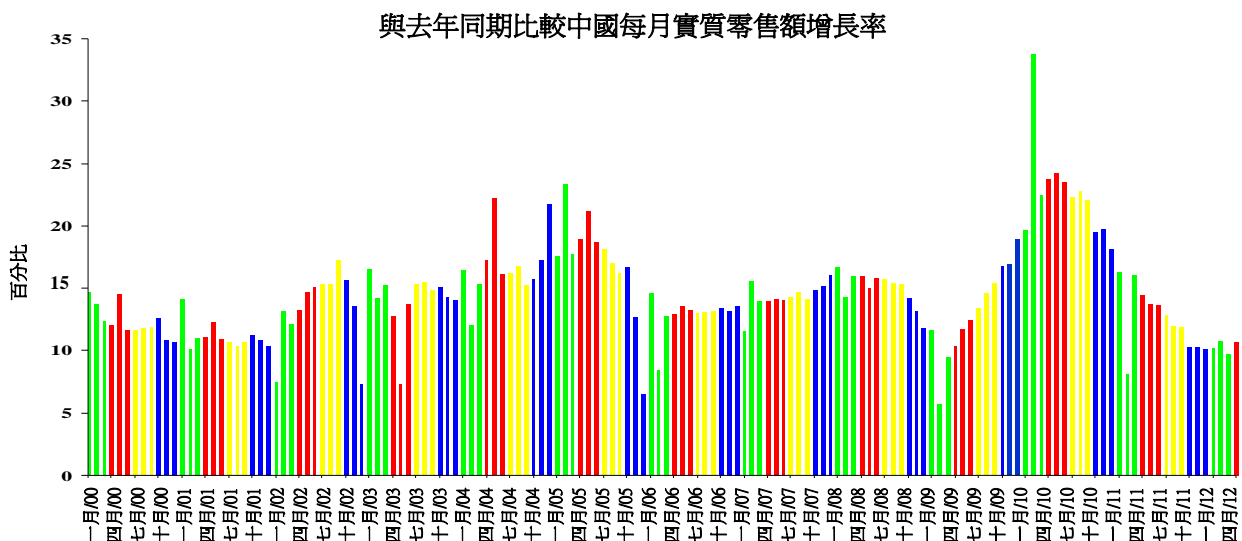
中國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自 1978 年起穩步上揚，2006 年達到頂峰，差不多佔 40%，隨後開始下降，至 2009 年僅佔約 25%。驟眼看來，這個比例好像相當高，可是，看看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這些地方，出口額之大可以是本地生產總值的倍數，相較之下，中國這個比例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中國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實際上誇大了出口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因為這個比率並沒有把中國出口貨的本地增值成分平均偏低這個因素考慮在內。

圖三：1970 年至今，中國商品與服務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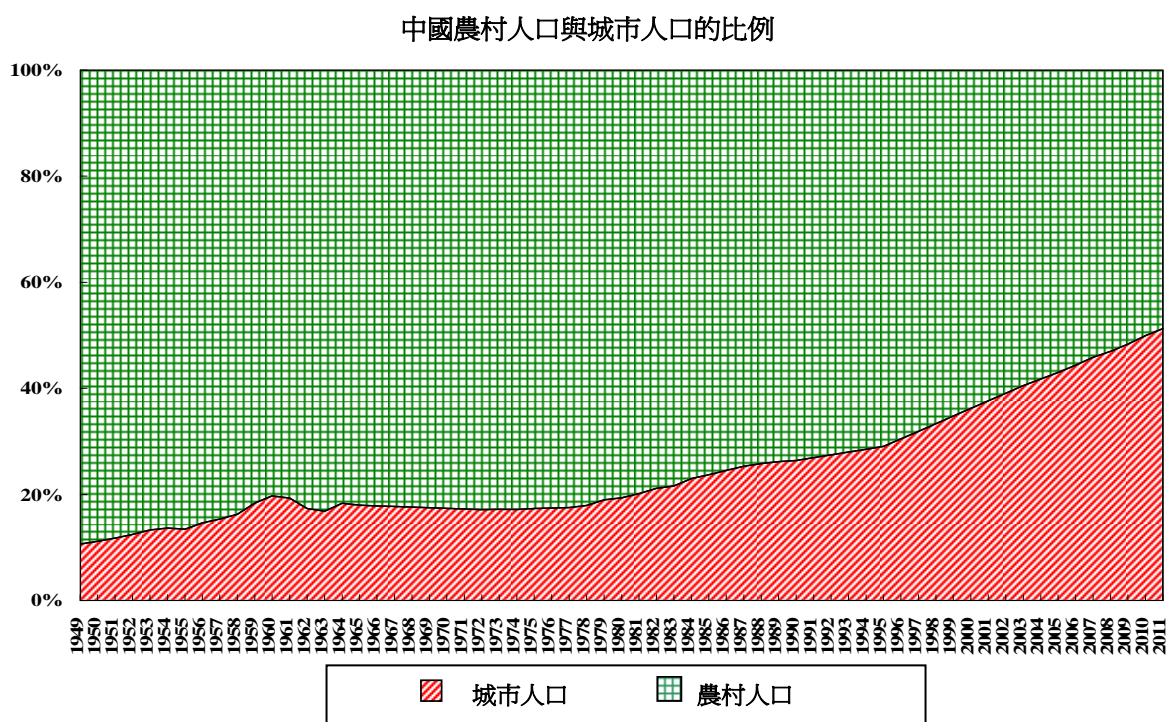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認為家庭消費有潛力可持續支撐中國國內總需求的增長的看法，時而有之。事實上，內地家庭消費的增加頗為迅速，這表現從 2009 年第一季開始，每月實質零售額增長率與去年同期比較一直保持雙位數字的增長。同期，實質零售額增長率遠高於實質國內生產總值或實質家庭收入的增長率，這多少反映了因應家庭收入增加而調整家庭消費的過程出現滯後。因此，即使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下降，實質消費增長率至少仍會上升一段時間。當然，要維持實質消費的增長大幅超前實質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唯一的可能是實質家庭收入繼續比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得快，而這個條件又需要家庭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斷提高才可以達到。

圖四：與去年同期比較中國每月實質零售額增長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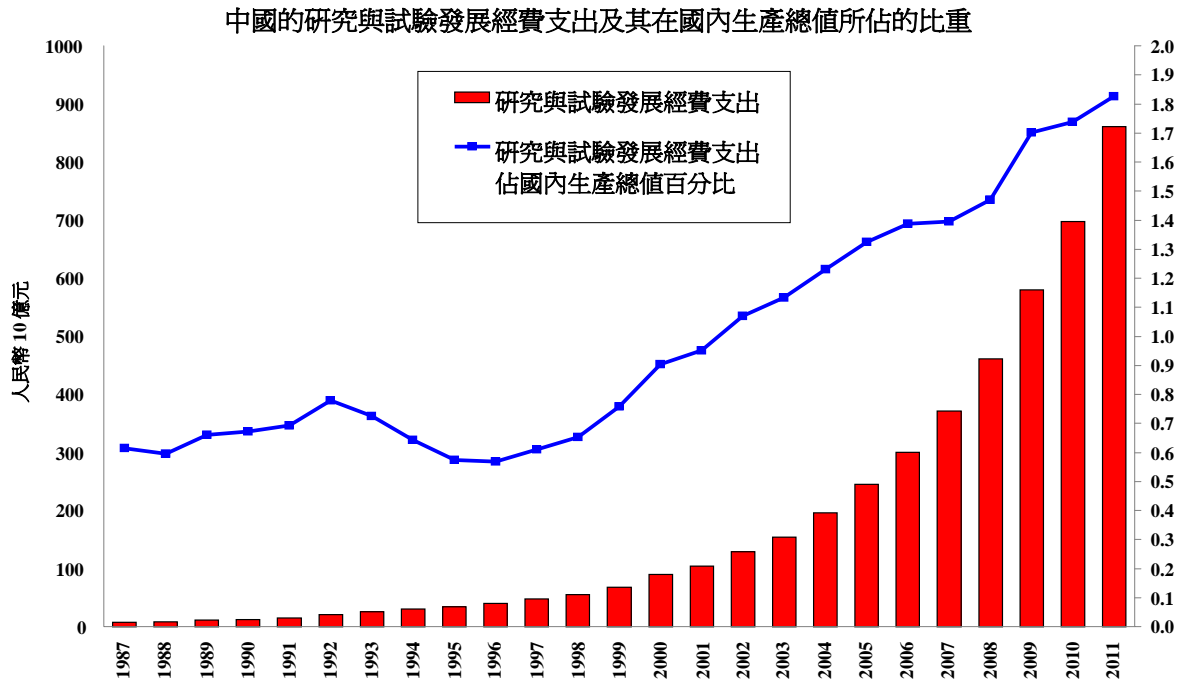
1949 年，全國人口近九成是農村人口，到 1978 年佔 82%，2010 年下降至 51%，仍有一半國民在農村生活。在「十二五」規劃五年內，預算農村人口比例會繼續減低至 47%。基本上，農村人口比例平均每年約減少 1%，與第一產業——農業的就業人口比例減少比率相若。

圖五：1949 年至今，中國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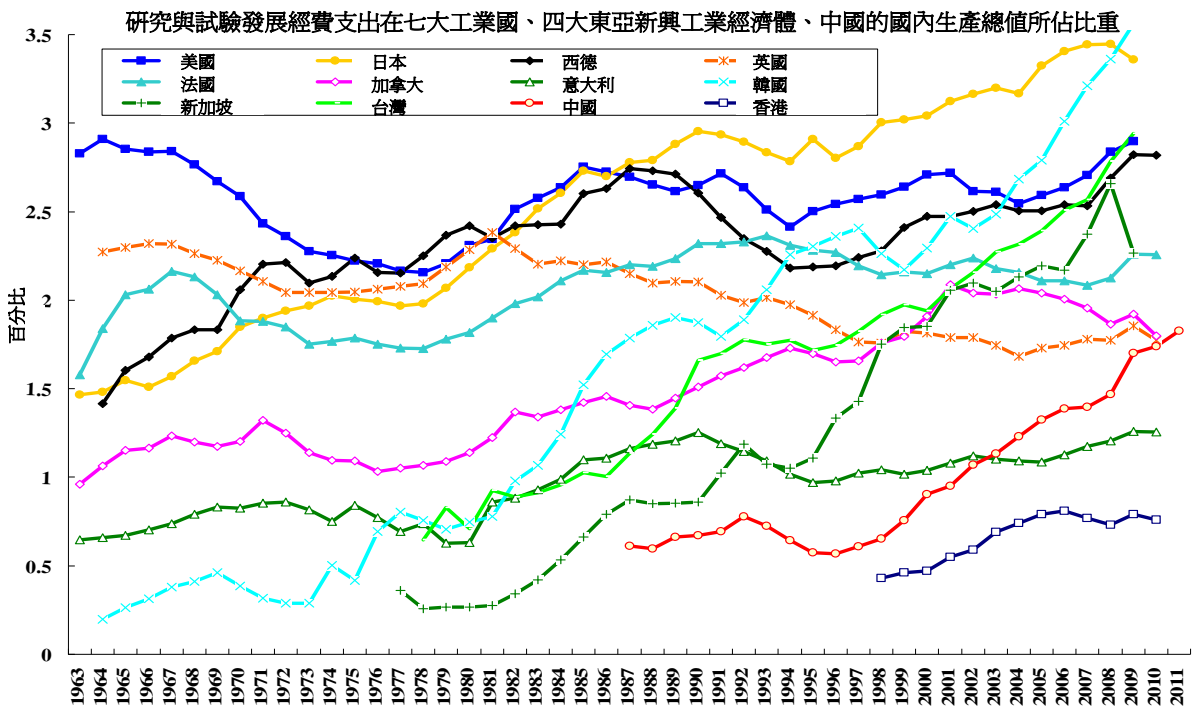
在經濟體裏，要發展技術，就需要對研發不斷投資。近年，中國亦開始針對這方面大量投資，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不論是絕對值抑或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迅速增加，但卻仍然落後於已發展經濟體和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在 2015 年，這項比重冀可達到 2.2%。然而，即使能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在這方面的投資還是低於美國、日本、韓國，要知道美國自上世紀 50 年代後期起，一直平均把國內生產總值的 2.5% 用於研發，而日韓兩國每年則撥出國內生產總值的 3% 作為這方面經費。

圖六：中國的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及其在國內生產總值所佔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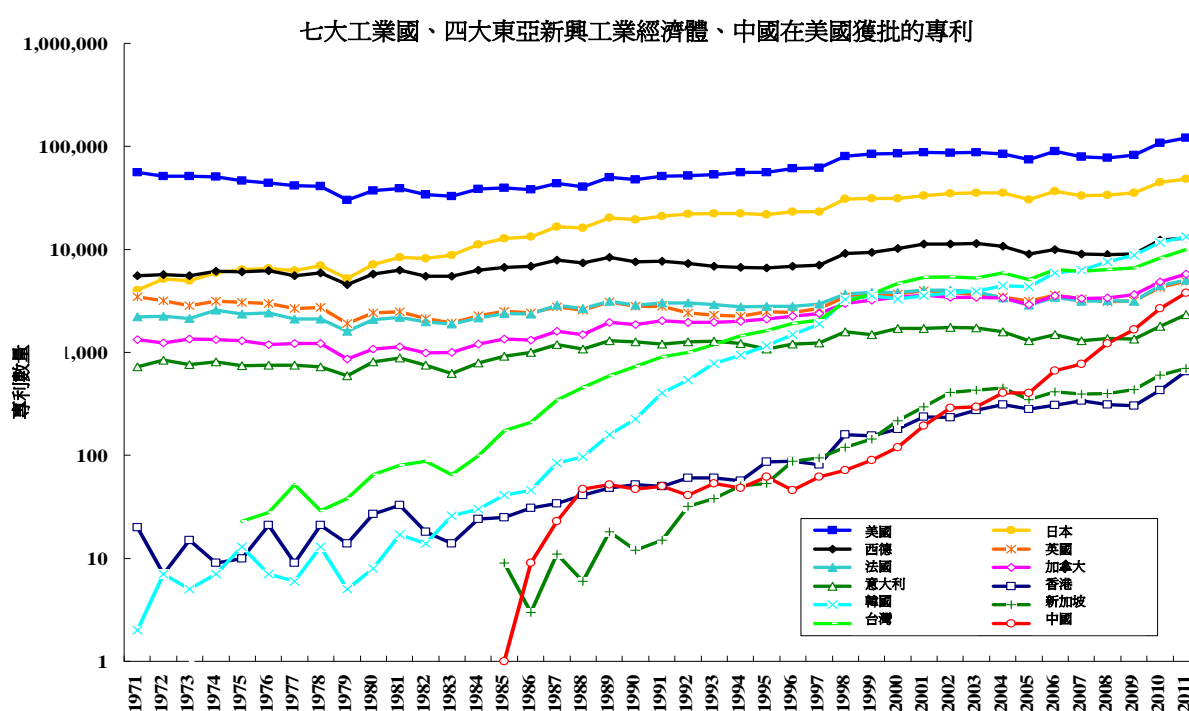
圖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所佔比重：

七大工業國、四大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中國



標誌技術發展潛力（即國家創新能力）的其中一個指標就是每年新增的專利數量。下圖顯示不同國家地區，包括美國本身，每年在美國獲批專利的數量。在過去 40 年，美國無庸置疑踞世界之首，在 2010 年取得的專利高達 10 萬項以上，日本緊隨其後，約 45,000 項。由於美國是審批國，美國或許擁有主場之利的優勢；但是，若我們只以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之間作比較，這應當是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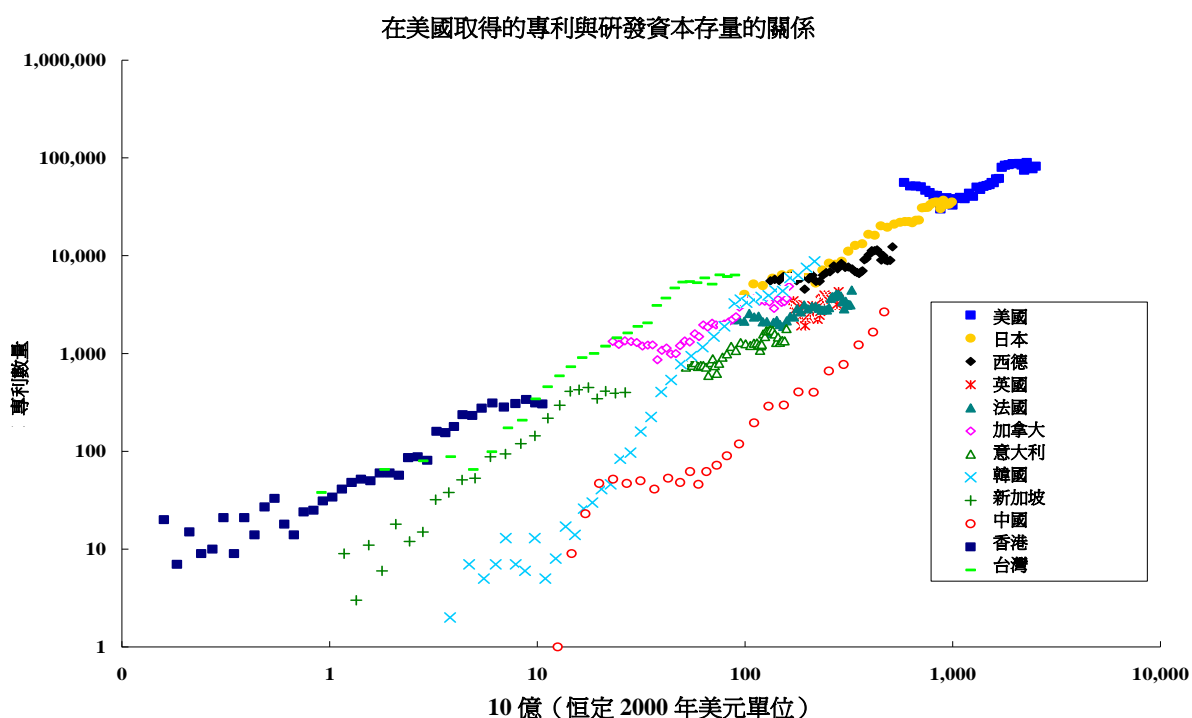
圖八：在美國獲批的專利：七大工業國、四大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中國



中國在 1985 年首次在美國取得一項專利，自此每年不斷增加，在 2010 年取得 2,657 項。單從專利數量而言，韓國和台灣一直領先中國，在 2010 年分別獲批 11,671 項和 8,238 項專利。

研發資本存量，以按年折舊 10% 後得出的過去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累計實質支出來計算，與獲批的專利權數量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下圖顯示了相對於每個國家、地區每年研發資本存量的專利數量。

圖九：在美國取得的專利與相關經濟體的研發資本存量



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能有效提升研發資本、商譽等無形資本的生產力，不管那是在本土發展還是從外購入都可以的。新產品、新工序的固定研發成本易於由龐大的市場攤分，而對商譽的投資如品牌建立所帶來的好處，市場越大，效果就越強。不過，要推動創新，關鍵在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這樣，中國的企業家才有動力把本地原創產品和技術、從外購入的專利和技術用於商業。偌大的國內市場也推使中國積極參與制訂產品和技術的標準，例如第四代無線通訊標準，以及主動與其他國家地區共享這類標準釐定所帶來的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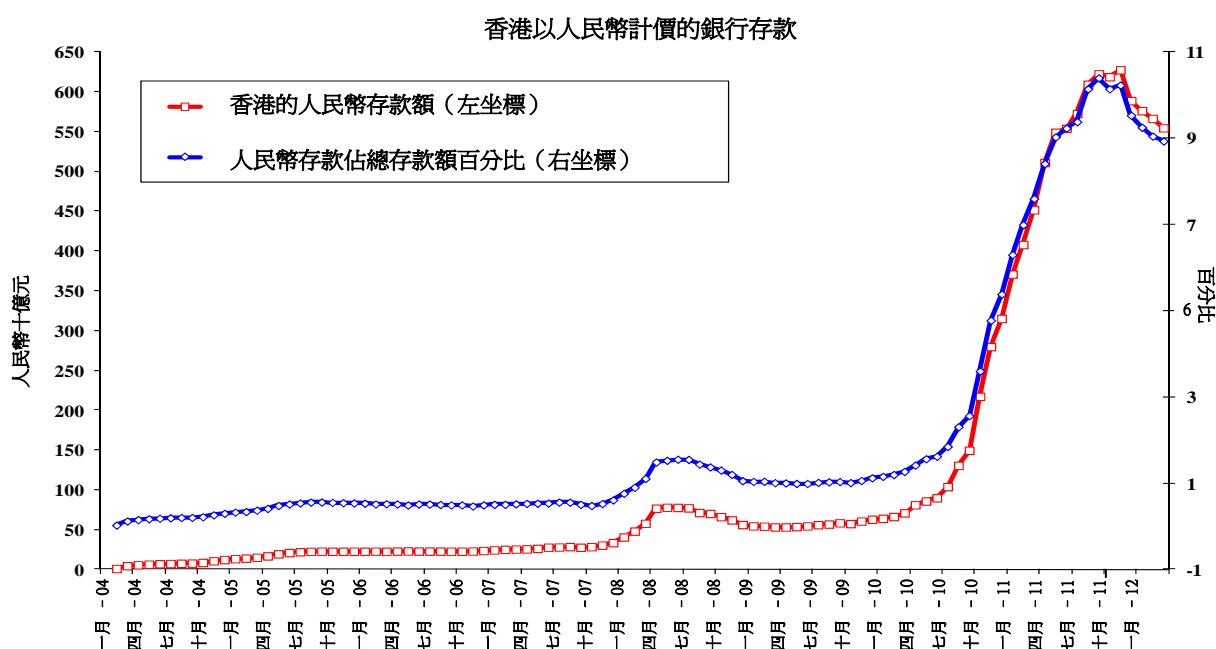
3. 人民幣國際化

1994 年，中國開始實行人民幣經常賬可兌換，但資本賬卻還未達到全面可兌換，資本的進出仍受政府控制，有些類別的資本流動需要先得到政府批准方可放行。不過，國民每年每人可相當自由地匯寄五萬美元，無需接受諸多查問。

個人或公司是否願意接受和持有一種非本地貨幣，視乎這種貨幣可否兌換，但我們並不需要它能全面可兌換，對經常賬和資本賬的可兌換都可以作這樣的理解。個人或公司會相當樂意接受和持有一種非本地貨幣，只要他們知道接下來的個人、公司同樣會接受這種貨幣就可以了，不管它能否全面兌換。

因此，舉例說，向中國出口產品和服務的出口商會頗為樂意以人民幣收取出口貨的貨款，只要他知道自己國家從中國進口商品和服務的進口商可以使用人民幣結餘支付進口貨的款項。儘管人民幣在法律上仍不可全面兌換，但由於在東亞經濟體得到廣泛接受，它在許多東亞國家已逐漸變為實際可兌換。比如說，雖然人民幣在香港、澳門、寮國、緬甸和其他許多周邊地區並非法定貨幣，但已得到廣泛接受，大量用作交換媒介、藏富工具。香港的人民幣銀行存款從近乎零，急遽上升至佔所有幣種合計銀行總存款額差不多一成（見圖十），由此可見，非本地貨幣即使不能全面可兌換，仍然有可能得到廣泛認受。

圖十：香港以人民幣計價的銀行存款



1978年，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實行經濟改革。自此，中國幾乎所有國際貿易，包括商品和服務的進出口，便一直以美元計價、結算。2009年，中國政府

挑選了一些地區，容許當地的中國進出口商，因應每宗交易，在進出口雙方同意下，自願選擇以人民幣結算。這項措施在 2011 年推行至全國。中國約有 30% 的貿易是和東亞經濟體進行的，要是中國進出口商與東亞貿易伙伴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那麼，中國為國際交易而對美元的需求將大幅減低，中國的央行——中國人民銀行（簡稱「人行」）就再也不需要握有現在那樣大量的外匯儲備了。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拿日本的情況來參照比較，目前日本約有一半的國際貿易是以日元來計價和結算的。

中國從日本以外的其他東亞經濟體進口的進口額，每年高達 3,000 億美元。僅此一項，如果可用人民幣結算，為交易而需要的外匯儲備將可減少。同樣，中國出口至日本以外的其他東亞經濟體的出口額，每年達 3,000 億美元以上，要是當地進口商能取得一定數額的人民幣（例如從當地出口商），他們就可以、也願意以人民幣支付中國進口貨的貨款。假如真能付諸實行，這些東亞經濟體的央行為交易目的而須持有的外匯儲備，同樣可以減少。

中國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佔總貿易的比例，已從 2010 年的 2.5% 升至 2011 年第一季的 7%，預料這個比例會繼續上升。迄今，中國的進口約有 90% 是以人民幣結算。為了讓中國出口商增加使用人民幣結算，海外進口商必須有渠道取得人民幣。這還需要一點時間。然而，向中國出口的海外出口商是以人民幣收取貨款的，按理他們手上的人民幣結餘可以為當地進口商所用。此外，中國人民銀行亦可成立或授權予機構成立人民幣離岸期貨市場，僅限真正與中國進行進出口貿易的進出口商參與市場活動，從而推動以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

假如其他東亞經濟體，好像香港、印尼、韓國、馬來西亞、泰國等等，也開始應用當地貨幣或人民幣作為彼此之間貿易的結算貨幣，那為國際交易而需求的美元數額將可進一步降低，以致這些經濟體的央行將可減少其外匯儲備中以美元計價的資產比例。

在 2011 年 5 月，中日韓三國財長在河內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期間會面並發表聲明，表示三國政府會研究使用本國貨幣與對方作貿易結算的問題。假如雙邊貿易基本上達到平衡，使用貿易伙伴的貨幣來結算其實簡單不過。可是，當雙邊貿易順差或逆差持續不變，問題便隨之而來：順差國落入持有逆差國貨幣的困局。那麼，要採取什麼措施，才可消除順差國的疑慮，保證其不會因為持有逆差國的貨幣一段不短的時間而招致損失？

一個方法就是由國家央行承諾，通過共同協議，以其他強勢貨幣（如美元或歐羅）、黃金或該央行發行的通脹指數債券，贖回其他國家央行所持有的本國貨幣。這項措施足以使順差國的央行安心，保證了購買力不會受損，說到底購買力才是最重要。假以時日，如果以當地貨幣作貿易結算能成爲一項普及持久的安排，也許最終會取代美元作爲國際貿易主要結算貨幣的地位。

只要中國人民銀行通過相互協議作出可靠的承諾，以美元、歐羅或其他所謂的強勢貨幣甚至商定平價的黃金，兌換外國央行拿來的任何數額的人民幣，那麼，即若人民幣在資本進出不再受管制的情況仍不可全面可兌換，其他國家、地區的央行或貨幣管理當局還是會在外匯儲備中保留人民幣的。外國央行亦可持有人民幣作儲備，日後一旦要和中國及其他願意收取人民幣的經濟體交易，這些儲備便可派上用場。目前，「人行」已和阿根廷、白俄羅斯、香港、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蒙古的央行或貨幣管理當局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這類協議將陸續有來。

人民幣最終會否成爲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仍有待觀察。一個國家的貨幣爲其他國家作國際儲備貨幣之用，好處壞處皆有，正反兼具。日元是全面可兌換的貨幣，但日本政府卻沒有鼓勵其他國家以之作爲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現時，雖然人民幣仍未全面可兌換，香港、新加坡、韓國已開始考慮把部分外匯儲備投資於人民幣計價證券，以分散投資。

4. 對國家開發銀行的意義

「十二五」規劃對國家開發銀行有什麼影響？在「十二五」規劃之下，中國將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外向轉往內需」，「從投入驅動走向科技創新驅動」。

中國主要依靠什麼使內需不斷增長？除家庭消費和公共基建投資（如高速公路、市內集體運輸系統、發電站）之外，還包括：（1）加快城鎮化；（2）房主自用住宅；（3）投資能源保育、乾淨可再生能源、環境保護和保育；（4）教育和醫療衛生，以及在這些領域應用高科技。

對基建項目作長期融資是國家開發銀行的強項，「十二五」規劃勢必帶來許多機遇。城鎮化需要基礎設施的支持，諸如公路、鐵路、機場、發電站、水務設施、通訊和光纖網絡、集體運輸系統、住宅房屋。降低能源消耗、減少碳排放需要對發電站作新投資，好像天然氣、水力、核能、精煤等發電設施，以及開發其他形式的能源。

「十二五」規劃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興建 3,600 萬套保障性住房單位。國家開發銀行可成立房貸部門，向金融機構、退休保障基金及其他長遠投資者發行息率固定的長期債券，再利用收益向起始貸款人購買息率固定的優質長期按揭貸款，同時應要求這些貸款人在他們發放的按揭貸款中保留 5—10% 的剩餘權益（以減輕道德風險）。通過這項措施，「國開行」可幫助更多人有能力購買這類保障性住房單位。

為推動創新，國家開發銀行可提供信貸，支持建造聯繫、貫通全國的光纖網絡，在全國各地提供免費或收費低廉的互聯網服務，有效加快資訊和知識傳播，並使沿海發達地區與相對落後的內陸和西部地區盡可能擁有均等的機會。有了互聯網，住在全國其中一個最貧窮的省份——青海的學生，有機會和全國最富

有的直轄市上海的學生，接觸到同樣的資訊；在萬維網裏，小企業可以在比較公平的基礎上與大企業競爭。

此外，國家開發銀行亦可通過本身的投資單位，在國際投資於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這類投資的基本概念是在未來的 Apple、Microsoft、Yahoo、Google、Facebook、Twitter 等潛力無限的新企業剛剛起步之時為其融資。對創業投資的投資，成功率很低，大約每 10 項只有一項能突圍而出；然而，只要挑選起步企業的眼光準繩，早着先機投入資本，回報是非常龐大的。況且，Apple、Microsoft 這些企業成功後，中國企業想要買下比如一成的股權是難乎其難（一來太昂貴，二來當地政治勢力會大加反對），可是在這些企業剛起步之時，可能性卻是不不少的。然而，要像推理一樣預測哪一項創業會成功，殊不易為。因此，「國開行」應當及早廣泛投資，廣撒種子，假以時日，養成幾棵大樹好收成。

國家開發銀行更可為發展商業規模的新技術試驗工廠提供信貸，發揮領導作用。新技術如煤製油轉換技術、頁岩氣液裂處理技術、核聚變技術，新物料如像鋼一樣強韌的塑膠，一旦證實可行，接續建造的工廠的單位成本將可大為減少。這些新技術能針對傳統的能源和物料，提供可靠的替代品，從而長遠來說可遏抑傳統能源和物料的價格上升。只有發展可靠的替代品，才能長遠有效地避免商品價格帶動的通貨膨脹。

「國開行」可向信用良好的中國直接投資者，提供以美元或其他外幣計價的長期貸款，讓其可投資該行通過在國內外發行外幣計價債券而成立的基金。「國開行」亦可直接向由中國人民銀行管理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借貸美元或其他外幣，息率貼近美國財政部及其他到期年期相似的政府債券所設定的比率。由於可長期借貸投資對象所在國家的貨幣，外向的中國直接投資者便可同時有效對沖長期匯率風險。與此同時，國家開發銀行是唯一適合提供基建貸款的銀行。中國時有企業在海外購入自然資源礦藏，為了開採和輸出，往往需要在投資對象的國家進行基建，「國開行」在這方面當可擔任重要角色。

隨着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在國外越來越易於取得，使用也日見廣泛，國家開發銀行可把握大好機會，進一步推動其業務運作國際化。「國開行」可向對內的外國直接投資提供長期貸款，例如向信用良好的外國直接投資者（如 Intel 和 Microsoft）在中國的項目提供人民幣計價的長期貸款，從而讓外國直接投資者可實質上從貨幣和到期年期兩方面配對自己的資產與負債。有了這樣的貸款，外國直接投資者就能有效對沖長期匯率風險。不過，爲了減輕道德風險，應當要求外國直接投資者（實際上是其母公司）向「國開行」開立直接貸款擔保，金額相等於所獲得的貸款額，但以美元或其他強勢貨幣計價。假如項目在商業上失敗，所餘資產不足以清還所欠貸款，則母公司將要代爲彌補差額。

使用人民幣爲中國國際貿易結算日漸普及，意味着中國進口商用於支付貨款予外國供應商的大量人民幣結餘將要在國外停留一段時間，直至進口中國商品和服務的外國進口商開始使用這些人民幣向中國供應商付款，才會回流中國。中國在海外的商業銀行當可發揮重要的人民幣結存中介作用。然而，礙於目前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基金的巨大息差，這類人民幣結餘以數量龐大的貸款或債券收益形式循環回流中國，很大可能會給中國金融業製造難處。

然而，國家開發銀行可採用一種不會影響國內金融業的「循環」方法。「國開行」可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僅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發售，比如香港（隨着中國國際貿易以人民幣結算不斷增加，或許可在其他地方增加購買點）。目前，國家開發銀行擁有半主權信貸評級，每年可離岸借貸大概不多於 2%，更有可能少於 2%，而在國內則每年至少可借貸 4%或以上。有了人民幣收益，「國開行」可從中國人民銀行買入美元或其他外幣，用以支持本身的海外業務運作；也可把這些收益借予對人民幣有合法需要的外國借貸者，例如支付中國進口貨的貨款，或者在中國作直接投資。這樣做，「國開行」實際上幫助「人行」減少所持有的外匯儲備，並減輕了「人行」不免要爲防範人民幣升值過多過快而須作對沖操作的成本。

最後，國家開發銀行作為中國具有開拓國際市場能力的政策性銀行，可以公共服務的方式，代表中國人民銀行營運一個人民幣期貨離岸銀行間市場。參與銀行間市場活動的商業銀行可出售人民幣期貨和美元給中國市場上真正的商品和服務進出口商（而不售予純粹外匯炒家）。

5. 結語

國家開發銀行應當堅守它作為中國政策性銀行的獨有主導地位，保持它獨有的項目融資能力，為規模極大、風險極高、年期極長以致一般商業銀行無法承擔融資的發展項目籌募資金。為了滿足對長期且息率固定的信貸需求，銀行不能依賴相對波動、短期、息率浮動的銀行存款來集資。基於享有主權或半主權信貸評級，國家開發銀行有能力通過資本市場籌集長期兼息率固定的資金，而且成本要比商業銀行為低。國家開發銀行應要充分善用這個獨一無二的優勢。

因此，國家開發銀行應保持國有獨資，不該作任何私有化。國有獨資使它可繼續享有主權或半主權信貸評級，無需承受由私人股東追求最大利潤（特別是短期利潤）而來的壓力。我們應從美國「房利美」部分私有化、「房貸美」上市的慘痛經驗中吸取教訓，政策性銀行從來就不該私有化。一旦私有化，不管是全部或部分，追求利潤往往成為管理層最重要的考慮，對政策目標置之不理。銀行會失去主權和半主權信貸評級，這使集資成本上升；即使能保住半主權信貸評級，卻會製造錯覺，令外界以為政府是不會讓一家政策性銀行倒下的，結果在管理層、私人股東以至所有市場參與者之間，引發道德風險。

致謝

借此一隅，謹向國家開發銀行和陳元董事長致謝，感謝他們邀請我參加國家開發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對再次獲邀參加會議，我感到非常榮幸，也很高興。陳元董事長對國家開發銀行的發展建樹良多，他領導國家開發銀行，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陳元董事長是中國銀行業的開拓先鋒，為業界引進過許多新概念、新措施，近年更帶領國家開發銀行踏出國門，走向國際，大大提升了銀行在海外的形象，擴大了海外市場，加強了銀行在海外的影響力。我第一次和陳元董事長見面大概要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當時他擔任中國的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其中一項重要職務就是負責管理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他任內，中國的外匯儲備從 1988 年的 30 億美元，增至 1997 年的 1,400 億美元。1998 年，陳元董事長獲委任為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一直擔任首席執行官至今（職銜在數年前由首席執行官更改為董事長）。